

超越范式

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

BEYOND PARADIGMS: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RUDRA SIL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美] 鲁德拉·希尔 彼得·卡赞斯坦 著

秦亚青 季玲 译

东方
编译
所译
丛

超越

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

BEYOND PARADIGMS: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RUDRA SIL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美] 鲁德拉·希尔 彼得·卡赞斯坦 著

秦亚青 季玲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美)
希尔(Sil, R.), (美)卡赞斯坦(Katzenstein, P. J.)
著;秦亚青,季玲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 Beyond Paradigms: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SBN 978-7-208-11073-1

I. ①超… II. ①希… ②卡… ③秦… ④季…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4658 号

责任编辑 龚 权
封面装帧 王小阳

超越范式

——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

[美] 鲁德拉·希尔 著
彼得·卡赞斯坦

秦亚青 季玲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 插页 4 字数 213,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073-1/D·2171

定价 37.00 元

中文版序言

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学者们都将范式和研究传统视为国际事务领域知识进步的关键因素。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学者就国际事务的实质、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有助于分析观察现象的概念等要素形成了共识性假定,并依据这些假定,对国际事务领域大部分重要知识的积累作出了贡献。但是,这些成就的代价也是很高的。全球事务领域的学术研究面对来自不同范式的理解、概念和论述,没有对其作出互补性的融合,因此越来越显现出一种危险的倾向:一方面在基本理论假定上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并就此展开反复不断的学术论争;另一方面则无视现实世界纷繁复杂的事态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术队伍迅速扩大,需要高度关注无意义理论争论的问题。

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指出范式导向研究的缺陷。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学者有必要抵制当下范式间论战的诱惑,以务实的方式思考如何应对现实世界中面临的问题。这可以称为“实用主义转向”。对于相似的实际问题,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概念、解释和论述之间会有多种关联,实用主义转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思考怎样整合这些关联要素。虽然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各种不同学术传统,而不是对范式置之不理或是完全摒弃,但是,范式不应成为学术思想的桎梏。有些学者甘愿冒着风险,探索来自不同范式或研究传统的理论概念,研究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似乎不可兼容的观点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国际关系学科现在应该重视这些学者的研究了。这就要求我们以新的思路来考虑国际关系研究的目标、考虑

如何组织设计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我们将这种新的思路称为“分析折中主义”。

分析折中主义希望发现一个共同的基础,然后将不同理论的观点有机地整合起来。但这并不是分析折中主义的唯一使命。分析折中主义也力图将学术研究与实践者/决策者面临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这种务实的方式并非是全新的,在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世界伟大文明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理念。但是,现代学术研究越来越与世界现实脱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主流范式之间的纯理论辩论反映了一种现象,那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已经十分严重。这可能是学术研究不能够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分析折中主义是与容忍精神和实践智慧这两种品质密切相关的,不过这两个重要的品质在当今的学术思想中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自然科学要好一些,因为自然科学需要验证理论和预测结果。社会科学必须具有容忍精神,必须鼓励实践智慧,这就需要承认诸如战争与和平、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地区与国际组织等国际事务本身具有可变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在与范式导向学者对话的过程中,分析折中主义可以帮助我们改进关于世界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缩小小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正是出于这种理念,我们撰写了这本书,这也正是本书向我们在中国、西方以及其他世界任何地方的同事和朋友提出的一种研究方向。

鲁德拉·希尔

彼得·J.卡赞斯坦

2012年4月

前 言

长期以来,我们两人既感到困惑又感到失望,这是因为不同理论范式之间就国际关系的本质展开了充满非理性色彩的辩论,并且,这些辩论反映了学术界和政治领域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2003年的一次研讨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我们界定了一种不同研究方式并就此展开了讨论,这就是我们现在称为“分析折中主义”的方式。研讨会上展开了热烈讨论,后来我们两人又共同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这为我们撰写本书奠定了基础。

我们两人相互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自己。比如,我们会感受到按时完成各自的任务所带来的便利,也欣赏每个句子不超过六行所产生的美感。我们两人相互发送了超过两千封电子邮件,交流思想,展开既严肃又诙谐的辩论,对我们的稿件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最重要的是,我们非常享受这种学术对话和智识交流,撰写本书带来的是无穷的欢快和愉悦。

过去的20年里,世界政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9年至1991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其后,基地组织发动了“9·11”袭击并导致了严重后果;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变化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使人们认识到学者赖以观察世界的范式所具有的局限。但这样的机会往往被忽视,而我们也往往搭桥砌墙,保护那些像海滩上建起的沙堡一样的范式,而不是去观察海风和海水是如何改变了我们建起的脆弱沙墙之外的地形环境。在本书中,我们对这种做法提出了

挑战。分析折中主义提倡对话,不仅鼓励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进行对话,也鼓励在同一领域中具有不同思想和使用不同方法的学者之间展开对话。我们认为,向具有不同思想和方法的陌生学者学习,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一种明智的投资。

学界通常是想法繁多,警言迭起,所有这些都说明本书必然有着自身的局限。我们两人也是学者,自然知道学者会对于本书提出的一些问题有着强烈的感受,也会发表激烈的观点。对于涉及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是什么、要做什么这类根本性的问题,没有人能说自己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仍在进行之中,这样的交流对于国际关系、政治学以及社会科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希望,在一个范式之间对话盛行的学科内提倡分析折中主义,将一些使用分析折中主义的优秀学术成果展示出来,定能推动这样的交流对话再前进一步。

我们在本书第三章至第五章讨论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与他们的学术交流使我们受益匪浅。这些采用分析折中主义的不同案例帮助我们凝练思想,同时也使我们更加坚信,折中主义的各种研究实践本身就是一道最强有力的屏障,保证任何试图将分析折中主义变为一种新范式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如果出现了那样的事情,绝对是一种极大的讽刺!由于篇幅和时间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在书中包含更多的折中主义研究成果和学者。当然,在我们的学术生涯中也看到无数优秀研究成果,无论在理路、风格还是在方法上,都没有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毫无疑问,我们也从这些非折中主义的优秀成果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们将本书献给三位良师益友,他们是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已故的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和恩斯特·哈斯(Ernst B. Haas)。三位师长都是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他们也都是20世纪下半叶享誉美国、享誉世界的最优秀、最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研究成果,今天很可能被划归世界政治研究的不同范式之列。还有,学生会告诉我们,多伊奇、哈斯和霍夫曼都是错误的。自然,年轻学者会扮演一种角色,那就是严厉地批评过往的学术研究,认为那是蒙昧时代的产物,而只有他们才能充满自信地宣布黎明的到来。这种做法我们再熟悉不过了。然而,前辈学者的智慧往往更显明睿。

多伊奇、哈斯和霍夫曼都是极其独立的学者。他们关心自己研究的世界，胜过关心自己的学术地位，也胜过关心理论和方法的推陈出新。他们三人学术气质和学术取向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著述和教学却展示了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会从新的视角提出研究问题；他们发展的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经验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与现实的政治和政策高度相关。他们像我们一样，时而也会出错，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他们不断地学习和吸收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他们超群的智识思维使他们轻而易举地穿越各种不同的学科疆界，他们从未丧失欧洲学者对美国学术风格的质疑性尊重，他们也总是能够看到理论模式的有限能力和人类智识的无限潜力。

多伊奇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虚构的故事，是关于托马斯·谢林(Tom Schelling)和莫顿·霍尔珀林(Morton Halperin)的。多伊奇眼里闪烁着黠慧的光芒，说谢林和霍尔珀林都提出过强制性博弈模式，两人也是按照这种方式驾驶。一天，他们驾车飞快地穿过哈佛广场，且都是目不斜视，不注意路况，并同时到达了一个十字路口。结果，第二天两人都是缠着厚厚的绷带走上讲台。哈斯很像他刻板严酷的德国父亲，常常尖刻地批评研究生，其中许多后来都成为各自领域的杰出学者。哈斯甚至给鲁迪(Rudy)写过一封言词激烈的信，信中说：“你不适合呆在伯克利。”那是鲁迪上完第一学期课程时的事情。但后来，也是哈斯让鲁迪给自己做研究助理，并担任鲁迪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哈斯的标准很高，但从不强求唯一的真理。霍夫曼至今仍然用那些尖酸刻薄的故事，讽刺自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国世界政治科学，他认为这种想法是自我膨胀，实际上却是非历史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因此实在令人尴尬。他们三人开诚布公地承认，我们在世界政治领域构建的理论和取得的研究成果是不成熟的，不确定的，也是充满争议的。

在当今范式主导的学界，多伊奇黠慧的眼神、哈斯严厉的真爱、霍夫曼尖刻的智慧往往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聊的评论、言语的攻击，还有几乎不加掩饰的幸灾乐祸。范式之间的辩论与范式之间的战争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虽然我们栖身于建筑在风高浪急的海滩上的沙堡之中，但我们却过度自信，一厢情愿地宣告胜利。本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微

薄的努力,目的是抵制这些不良的倾向。作为参与对话的学者,我们虽然远远不能达到斯坦利·霍夫曼、卡尔·多伊奇、恩斯特·哈斯那样高的标准,但是他们的学术胆识、他们的虚怀若谷、他们的真实坦诚、他们对不同观点的开放心态,却是对本书的重要启迪。

鲁德拉·希尔

彼得·卡赞斯坦

2010年7月于费城和普林斯顿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 I

前言 / III

第一章 分析折中主义 /1

第二章 折中主义、实用主义与国际
关系研究范式 /22

第三章 战争与和平、安全与不安全 /45

第四章 全球政治经济 /92

第五章 地区和全球的秩序与治理 /137

第六章 结论 /184

参考文献 /204

第一章

分析折中主义

《华盛顿邮报》刊登了约瑟夫·奈(Joseph Nye 2009)的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站在边缘的学者》。文章对国际关系领域理论和政策之间日益加大的鸿沟深表叹息。他说:“学者越来越不关注自己的研究与政策领域的关系……那些提出决策者根本看不懂的、充满专业术语的数学模型、新方法、新理论的人会得到更快的晋升。”约瑟夫·奈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这再次明确提醒人们注意查尔斯·林德布卢姆(Charles Lindblom)和戴维·科恩(David Cohen 1979)在30年前的评论是多么正确。他们说,社会科学研究“供应者”提供的产品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潜在“使用者”的需求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条鸿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之一就是社会科学知识过度的独立分割,在国际关系领域尤其如此。简言之,学术界太多的社会科学研究门派分立、各循其道。我们往往将这些门派称为“范式”(paradigms)或是“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s)。依照范式进行研究确实能够产生深刻的洞见,但是,如果不能以相互补充的方式对多种范式引发的洞见加以比较和融合,这些范式反而有可能成为“理解障碍”。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 1970)很早之前就指出了这一点。

采用范式研究方式的学者首先预设一套与别人不同的假定作为研究基础,提出研究问题,确定研究范畴,然后根据是否与假定相吻合来检验研究成果。他们依照公认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原则,提出一套理论或论述,确定某种因素而不是其他因素为原因变量。根据这种研究方式,坚持某

种范式的学者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发现了新的事实,提出了越来越精致的理论。但是,只有坚持这一范式的人才会承认这是一种进步。而对于本学科一般人员或是学术圈之外那些希望从社会科学中得到有用知识的人来说,却并不承认这是进步,因之也不会欣赏。事实上,学术讨论有可能成为置复杂纷乱的日常问题于不顾的孤芳自赏式的学术辩论。

在本书中,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指出范式导向的学术研究的不足。我们认为,学者有可能,也完全有必要摒弃这样一种思维,即某种理论传统在提出和解决问题方面具有先天的优越性。我们还认为,学者也可以应当认识并且厘清原本在不同范式中确立的诸多概念、观点和因果机制之间存在的联系。同时,“超越范式”并不意味着摒弃或是无视以范式为导向的研究成果。“超越范式”意味着探索似乎不能通约的各类范式类理论要素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目的是提出对政策辩论和实际问题有用的新颖见解。这就要求我们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思考假定、概念、理论、研究设计以及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这样一种方法称为“分析折中主义”。¹

最先注意到范式导向研究缺陷或是提到分析折中主义的并不是我们。但是,我们论述的不同之处在于创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分析折中主义体系,阐述分析折中主义与现有诸家学派如何交流与融合,说明分析折中主义对当下的学术和政策辩论增加了什么新的价值。这不仅仅是提倡多元主义和包容精神,也不仅仅是呼吁人们放弃理论研究而多作政策分析。分析折中主义的目的是在不同理论流派之间建立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有益联系。这些理论流派在实质上是密切相关的,但在理论建构上则成为各立门户的不同范式。分析折中主义基于一套实用的假定,淡化僵硬的认识论观点,重点讨论学术成果对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分析折中主义挑战以范式假定为标准所划定的分析界限,反对仅仅是为了符合某种特定研究传统而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分割肢解。分析折中主义的做法是明确与真实世界密切相关的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将经验观察与不同范式理论或阐释中提出的因果机制结合在一起。分析折中主义的这种做法会使我们能够作出更充分的解释,也能够缩小决策者和非专业人士所需要的实际知识与学科和次学科领域生产的研究成果之间的鸿沟。分析折

中主义倚重各种理论范式和研究传统内产生的理论和经验成果,目的不是摒弃这些范式和传统,而是揭示一个事实:看上去相互分立和互不通约的理论与研究传统之间,存在实际上的相关和实质性的联系。

本章首先界定我们所说的范式和传统,考量范式的优点以及局限性。然后会更加明确地定义分析折中主义,更加详尽地揭示为什么分析折中主义可以成为范式研究富有价值的补充。我们还会讨论不同研究传统的理论之间所谓的不可通约性会带来什么问题,指出分析折中主义与综合使用多种范式、多种方法、三种主流理论等方式的不同之处。最后会提出界定分析折中主义研究的三个标准。

本书第二章讨论分析折中主义与国际关系各种范式之间的关系:现实主义强调物质性能力的分布,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集体行为体寻求的利益与有效收益,建构主义强调影响行为体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以及自己在这一世界中身份的观念因素,我们则强调这三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第三章到第五章评析国家和国际安全领域(第三章)、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第四章)、全球/地区治理领域(第五章)采用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成果。第六章我们探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分析折中主义优秀成果带来的启示。我们并没有提出一个综合的分析折中主义指导范式,因为这样做就会违背分析折中主义的实用原则。我们强调的是,如果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式,在提出研究问题、构建解释框架、理论结合实际等方面都会是独具特色、大有裨益的。我们也考量了分析折中主义研究从专业角度对个人产生的风险和负面作用,同时指出为了弥补范式研究的不足、为缩小约瑟夫·奈所说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鸿沟(Nye 2009),采用分析折中主义的方式是必要的。我们还注意到,在其他学术和实践领域,主张使用分析折中主义的论述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了。

范式与研究传统

社会科学学科经历了不同学派的论争,每一个学派都声称自己为解

释本学科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更好的分析框架。构成这些学派之间分歧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对具体现象存在实质性争议,而是它们背后不同的形而上的假定,因为正是这些假定决定了如何建构和证实理论。虽然这类假定一般无法诉诸经验性测试,但却影响着诸多研究步骤,比如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一般性法则,或是更加深入地了解具体情境中的行为,还是推动批判性和政治性的行动;再比如怎样确定实际现象中哪些方面值得研究,如何就这些现象提出研究问题;还有建立什么样的概念、方法和标准来回答所提出的研究问题,最后成形的是理论、模式、叙事还是人种历史等等不一。²

根据托马斯·库恩的重要著作(Thomas Kuhn 1962),一些学者采用了范式这一概念来勾勒和表述基于不同核心假定的研究理路。库恩质疑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1959)关于界定科学知识的观点。波普尔认为证伪是科学知识不断进步和积累的试金石,而库恩则将科学史视为一个由不同常规科学阶段构成的连续体,打破这些常规科学阶段的是相对短时间的科学革命事件。常规科学阶段通常会出现一个主导范式,这个范式决定了核心研究问题、所使用的理论词汇、可接受的研究方法以及针对某个研究问题产生的研究成果的评估标准。一旦这些步骤得以完全的制度化,范式的薄弱环节就被遮蔽起来,其基本假定也不会再受到质疑,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或是被忽视、或是被视为超出了正常研究的范畴。在常规科学阶段之间为时不长的间隙里出现了科学革命,即科学共同体被与日俱增的反常现象所困惑,开始集中考虑新的研究问题,采用新的方式,以解释这些反常现象。一旦新的一组问题、假定和方式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也就开启了新范式兴起的大门。重要的一点是,各种范式被认为是不可通约的,这就使得融合或比较不同范式框架内的理论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一些学者(Elman and Elman 2003)使用了伊默尔·拉卡托斯(Imer Lakatos 1970)“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的概念,区分不同学术流派,判断某个学术领域进步的可能性。库恩认为没有客观标准来确定持续的科学进步,拉卡托斯在回应库恩的时候,提倡多个科学共同体共存的多元观点,认为每个科学共同体都有自己的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的

研究纲领有着许多特点,比如“硬核”、辅助假定构成的“保护带”、正面和负面的试探等等。实际上,这些特点与库恩的范式具有同样的功能:它们保护理论的形而上的假定,使其避开质疑,也避开经验性检验。但是,拉卡托斯给了某种理论的支持者捍卫和改进这一理论的机会,而不是一见到与理论不符的客观证据或理论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就否定理论本身。这样一来,理论的“耐久力”就得以增强。研究纲领是否可能得以捍卫和改进,直接关系到拉卡托斯提出的“进步性”与“退化性”研究纲领之间的区别。进步性研究纲领能够产生超越原有理论解释能力的新理论,同时又能够解释原有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退化性研究纲领则面对越来越多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对此只能提出一些权宜性解释,且这类解释与在进步阶段发展起来的现有理论只存在松散的联系。拉卡托斯的科学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诸如国际关系领域不同学派的不同发展轨迹。但是,拉卡托斯理论同样认为,实质性研究的进步是在科学研究共同体内部产生的,共同体成员对核心假定、问题、方法以及评估标准有着一致的看法。没有这种共识,不同研究纲领的支持者则不可能就某个特定的研究纲领具有进步性还是退化性达成一致。

无论库恩和拉卡托斯理论在阐释自然科学发展史方面有着多大的贡献,在理解国际关系领域持续不断的辩论和学术思想的变化时,他们的科学进步观却显露了自身的局限性。与实证主义相关的各种理论之间的分庭抗礼、论争不休,显然难以用只有一种范式主导的“常规科学”阶段加以解释。拉卡托斯虽然认为多种研究纲领可以共存,但他也没有预见到整个学科出现不同理论之间的无休止论争,且每一个理论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的理论具有“进步性”,而反对者则认为其具有“退化性”。进而言之,采用同一研究纲领的学者也会以不同的方式考量和强调各种各样的基本假定。这样一来,研究流派各自为营,分别根据自己的“硬核”和“保护带”从事研究活动。国际关系建构主义阵营中流派纷呈的现象就是一个例子(Checkel 2006)。实际上,范式之间的最重要分野是那些具有持久性特征的“根本分歧”,比如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行动者与结构、物质与观念,等等(Abbott 2004, pp. 162—170),这些根本分歧也导致并构成了同一范式或研究纲领内部的辩论。³同时,某些本体论原则也会

被基于不同范式的多种理论共同接受,比如有些建构主义学者接受现实主义的观点,承认国家的基本动机是在无政府体系中生存的需求,而另外一些建构主义学者则接受自由主义的观点,强调国际制度可以导致国际合作行为的产生(Chernoff 2007, p. 69)。总之,虽然库恩的范式观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领域理论辩论的一些方面(Elman and Elman 2003),但是,僵化地使用库恩和拉卡托斯理论无法解释社会科学诸学科纷繁复杂和充满论争的历史,对于国际关系领域也是如此。

在本书中,我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范式的灵活界定,它接近拉里·劳丹(Larry Laudan 1977, 1996)提出的“研究传统”的概念。劳丹像库恩和拉卡托斯一样,认为长期存在的认识论观点主导了任何特定研究领域里研究活动的外延与内涵,因此具有核心作用。这些认识论观点导致了各种分立的研究传统,每个研究传统都包含以下因素:“(1)一套信念,用以确定研究范畴包含何种实体和过程;(2)一套认识论和方法论规范,用以确定如何在研究范畴内从事研究活动、如何验证理论、如何收集数据,等等”(Laudan 1996, p. 83)。但是,劳丹与库恩和拉卡托斯不同的是,他没有提出一种统一的标准,用以判定先后出现或是相互竞争的研究方式哪一种具有进步性、哪一种具有退化性。恰恰相反,他认为不同研究传统不仅可以共存,而且可以频繁地相互影响。他还指出,在面对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的时候,研究传统不是相互排斥的。来自不同研究传统的实质性理论无论是在研究成果还是在内在意义上都有着交汇的地方。劳丹甚至认为,一个学者可以使用多种研究传统,即便这些研究传统的基本假定被普遍认为是不可通约的(Laudan 1977, pp. 104—110)。

因此,劳丹提出了一种社会科学观: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不一定是库恩所说的那种次序井然的范式交替传承。进而,在任何时候,也不必硬要把多彩纷呈的学术活动塞进拉卡托斯设定的为数不多的研究纲领之中。劳丹认为,纷繁复杂的知识生产方式可能导致不同研究传统之间有着重叠的假定和相似的实质性解释。当我们梳理过去 50 年国际关系领域里出现的不同思潮的时候,劳丹的观点可能更加切合实际。劳丹承认学者可以进行跨范式研究,因此为不同研究传统产生的不同理论之间的“融

合”开启了可能之门(Laudan 1977, p. 104)。我们在全书中所使用的“范式”和“研究传统”两个术语的意思是相同的,这就是劳丹所界定的“研究传统”。

根据特定范式设计和确定的实质性研究可以作出重要贡献。对于任何一个已知问题,在持不同观点的诸多学者聚集的学术共同体展开广泛讨论之前,如果有一组界定明确的概念、一种共同的理论语言、一套基于共同的形而上观念的方法和评估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比较集中有序的对话,自然是十分有用的事情。这样一套初始的共同理念使得经验研究更具明确的重心,且在特定的研究传统框架中更容易达成一致标准,更容易比较研究成果和积累知识。这样的研究程序便于产生清晰、简约的论点,还能够启动初始知识的积累,这样一来,在进行研究的操作化和展开创新研究的时候就不必每次都要从头开始。比如在国际关系领域,(新)现实主义范式提供了一种共同的理论语言和分析框架,使得围绕战争原因、结盟方式、威慑逻辑等现象的学术辩论更加集中。同样,新自由主义理论学者采用了一套鲜明的形而上假定,以此作为他们的研究起点,目的是提出一套核心理论,解释相互依存的定义和作用,指明通往制度化合作的不同路径。还有一点也值得强调,范式之间的“创造性交锋”(Linhbach 2007, p. 274)往往推动一个范式内的学术进步,促使该范式学者改进他们的理论和叙事,以应对其他范式的挑战。

当然,这类学术裨益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任何学科实现大幅度进步。不同范式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框定研究范畴、确立研究问题、诠释经验数据、具体提出有意义的因果机制。由于社会科学强调简约性,坚持范式研究的学者同时也会高度依赖简化方式,以便比较容易地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简单的研究问题,比较方便地使用他们喜欢的概念和方法。客观事实的某些侧面在一种分析框架之中如果不能形成问题、未能得到研究,这些侧面就会被遗忘,被置于“黑匣子”之中,或是被视为“分析模式之外的因素”。这种方法之所以存在问题,是因为同样的经验现象会在不同的范式框架中得到不同的解释。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唯一的原因就是不同学者坚持不同形而上理念,因此也只能使用与自己坚持的形而上理念相关联的假定、概念和方法来解释经验事实。由于每一种范式都提